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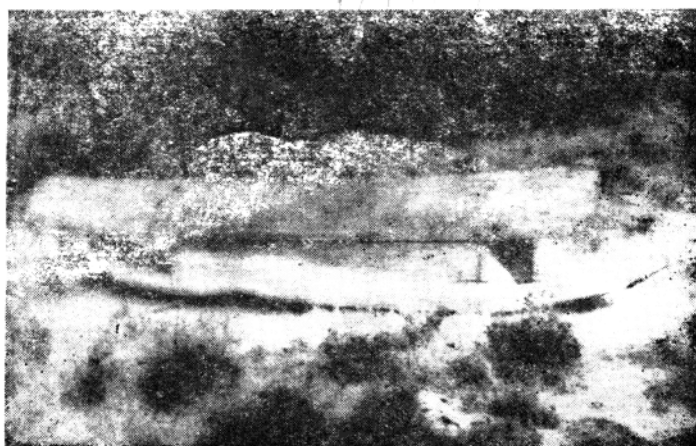
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 主办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民族 论丛

MIN ZU LUN CONG

7

147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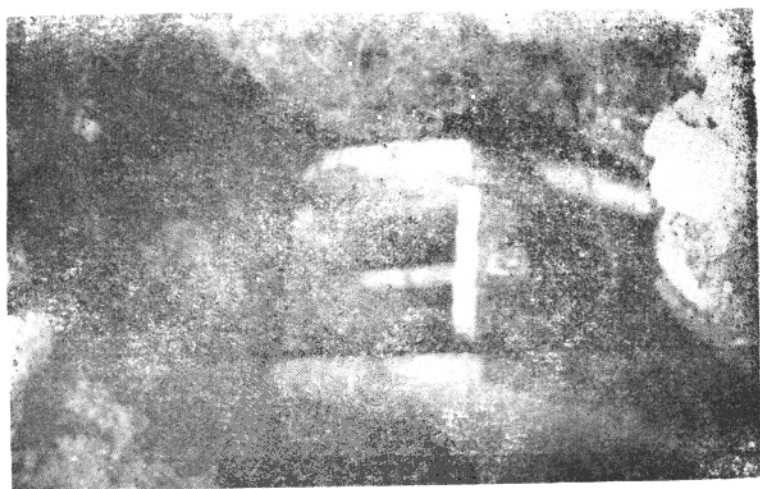
图一 福建武夷山的船形棺



图二 四川长江三峡巫溪县南门湾悬棺葬外景，
陡河岩壁上许多悬棺葬人工凿穴，箭头所指为一具棺木。



图三 贵州贵阳市高坡乡苗族崖洞葬



图四 广西南宁县里湖乡瑶族崖洞葬棺木

民族论丛

第七辑

目 录

就黔江地区情况谈民族与民族问题·····	李绍明 (1)
——在四川省民族地区科普工作队赴黔江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问题初探·····	尹大林 赛 翊 (7)
峨边经济的回顾与展望·····	秦和平 关荣华 (13)
攀枝花市盐边县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研究·····	李星星 王成孝 (21)
攀枝花市迤沙拉与高坪两地彝族人口现象比较分析·····	李小蓉 (29)
民族教育事业面临的问题和出路·····	杨健吾 (39)
——德格·甘孜·九龙三县民族教育现状的调查分析	
平地彝族的家庭变迁·····	陈庆华 (47)
攀枝花市迤沙拉村宗教历史及现状·····	李 森 (67)
泸定岚安历史文化考察记·····	杨嘉铭 (77)
凉山彝族服饰·····	冯 敏 (86)
会东民族民间挑花刺绣艺术·····	胡立嘉 (95)
徐老和民族史研究·····	冉光荣 (97)
——为纪念徐中舒教授从教六十周年而作	
北川羌族述论·····	冉光荣 周锡银 (104)
北川县青片乡羌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115)
四川大学历史系赴北川实习组	
清代川边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许茂慈 (125)
我国南方地区的悬棺葬与崖洞葬之比较研究·····	陈明芳 (138)
泸定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林俊华 葛尊武 (148)
鱼通土司及其衙门考·····	吴吉远 (167)
多麦历史述略·····	毛儿盖·桑木旦著 云 登译 (175)
尔龚语的复辅音和声调·····	刘辉强 (193)

就黔江地区情况谈民族与民族问题

——在四川省民族地区科普工作队赴

黔江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

李绍明

黔江地区是以土家族和苗族实行区域自治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这里有五个民族自治县，人口257万，其中土家族、苗族占总人口的53%。因此，民族问题是个大纲。今天，省科普工作队要我就民族问题作个发言。下面，我就结合黔江地区情况，以民族与民族问题为题，试讲三个问题。由于黔江地区民族成份的恢复工作与民族工作的进展不过十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可能不准，发言若有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关于民族

什么是民族？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是一种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并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通常认为，构成民族的有如下四个要素：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四要素说”一般来说是对的，但不能绝对化，把它看作教条。事实上，民族总是在一定交往和相互依存的环境中生存，在其历史进程中，由于长期的相互影响和社会变迁，一个民族的某些因素可能会淡化或消失。但是，某些因素的淡化消失，并不能改变他作为现实存在的一个民族的事实。例如，明末清初满族入关后，由聚居变为杂居，逐渐消失其共同地域，语言也慢慢消失了，以前的共同经济生活也不存在了，民族习俗也大多改了。加之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满人大多隐姓埋族，其民族特点消失更快。有些人曾因此而提出满族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这是不正确的，不承认是不行的。满族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有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上的民族，也是现实存在的、应得到尊重的重要的民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满族人口已恢复到500多万。又如回族，遍布全国各地，大多数长期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缺乏单独的共同的经济生活，并讲汉语。但回族仍不失为一个民族，他有许多明显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点。

可见，不能仅以是否具备四个要素作为判别一个民族的绝对标准。维系一个民族的存在还需要一种因素，就是民族的自我意识。苏联民族学界就有人提出，斯大林论述四要素是不够的，还应该加上一条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认同感，有人也把这一点归入上述第四个要素中的共同心理状态。我以为，提出民族自我意识和认同感，很有道理，也确实重要，似可考虑分出来独立为构成民族的一个要素。

基于上述认识，来谈谈我们黔江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情况。过去有人说，湘鄂川黔交界一带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早已汉化了，还能说是少数民族吗？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黔江地区的大多数少数民族长期未得到承认，有人为此说几句话，甚至也被扣上搞民族分裂的帽子。但民族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川东南的土家族、苗族与湘西、鄂西、黔东南聚居区的土家族、苗族一样，共同有着悠久的历史。远的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巴国，至少在一千余年前铸立溪州铜柱的五代时期，四省结合部处就是土家族、苗族等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了。这就是他们的共同地域。他们在这里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虽然长期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历代统治阶级的强迫同化（尤其是清代“改土归流”后），使他们的民族特征消失了一些。但是，他们至今仍保留着自身的许多特点，如在酉水一带及湘西保靖、龙山、永顺、古丈一些地区的土家族，还几乎完整地保持着土家语。秀山晏龙一带的苗族至今还讲苗语。更重要的是，川东南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对自己的民族仍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认同感，并一直争取得到作为一个民族的应有尊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民族政策在这里得到了落实。首先由鄂西带动了川东南，川东南又影响到黔东南。这是好现象。我们这里的少数民族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少数民族了。当然，民族是一种能动因素，将随历史发展而演变，直至最终消亡。现实的土家族、苗族已经不是前资本主义时期那种广义的民族了，而是已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了，是现代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土家族、苗族作为客观存在的少数民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样，不仅需要进一步发展，而且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二、关于民族问题

所谓民族问题，就是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按照广义的民族定义来说，阶级社会以前，即原始社会时期，不存在民族问题。阶级社会产生以后，有了民族奴役、剥削和压迫，就产生了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民族问题是由于民族之间剥削、压迫、不平等关系的出现而出现的，说阶级社会的民族问题，其实就是说民族之间包括统治、压迫、剥削、奴役、歧视等在内的不平等关系问题。当然，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从来是友好的。

在历史上，除了元、清等朝代及个别地区、某些时候有过少数民族统治、压迫汉族的情况而外，大量的都是汉族统治和压迫少数民族。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主要是作为统治民族的汉族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汉族是对兄弟民族欠了债的。当然，说汉族剥削压迫少数民族，这应归罪于汉族中的统治阶级。周总理在1950年曾语重心长地给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同志讲了一句话，说：参加访问团的汉族同志要怀着赎罪的心情到民族地区去工作。当时李维汉同志解释说：不是赎自己本身的罪，是为我们祖先赎罪。总理高瞻远瞩，一句话说到了汉与各兄弟民族间历史关系的实质。

到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有没有民族问题呢？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仍然存在。一方面，是历史遗留的，需彻底肃清的民族间的歧视等问题；另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后进状态，与主体的汉族民族

长期作为统治民族是直接相关的。由于历史造成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存在的一个根源。

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认识，曾经过一个痛苦的历程。解放初期我们承认有民族问题，那是民族工作的黄金时期。后来正确的东西被左的错误否定了，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民族问题，也就不谈民族问题了。至少认为它不是一个大问题，或者与现实关系不大，这就导致对民族地区许多事情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甚至更左，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拿我们四川凉山彝族来说，解放前，凉山彝族还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与内地汉族社会发展状况相比，客观存在很大的历史差距。但在左的时期却不承认这一点，发展经济采取了甚至比内地更左的办法。当时有个错误的认识，说奴隶一无所有，更具有或更易接受公有制意识，于是急于在所有制改造方面一步登天，造成了经济衰退和民族关系紧张等严重后果。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不仅存在民族问题，而且对待民族问题千万不可掉以轻心。现在这一点已经明确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解决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应当进行这方面的巨大努力。

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民族地区处在梯度开发理论划定的边际地区，属于“第三世界”。看来，我们还得正视差距，正视“马太效应”、梯度理论给我们带来的不利。但是，事物总是要发展的，民族地区不能因此稳步不前，相反还应争取走得更快一些。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就曾以牺牲少数民族的利益来实现主体民族自身的发展，但到头来由于受到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以及少数民族的抗议，还是不得不回过头来致力于民族经济补偿和提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去年我到美国访问，对此深有感触。美国开发西部，就象最初登上新大陆的西班牙人一样，曾以灭绝人性的方式对待土著印第安人。但到了现阶段，美国的民族问题已发生了变化。现在印第安人已经觉醒，他们也高举民权的旗帜要求联邦政府对那段不公正的历史和民族遭受的损失予以纠正和赔偿。现在联邦政府只得年年给印第安人以大量拨款扶持，并实行了包括恢复和发展印第安人文化的多元文化发展政策。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步。我想，资本主义国家尚且能给予民族地区以特殊的、有利于民族发展的政策，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更应不成问题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有两个特征：一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各民族联系的加强，导致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越来越多；二是由于少数民族的觉醒，民族优秀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各民族越来越珍视自己。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展，这两方面的特征将日益增强。这两方面特征都有利于我们缩短落后的民族与先进民族的差距，有利于消除民族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有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当然，要彻底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最终还要取决于我们民族自身的发展。这当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扶持与先进的民族——汉族老大哥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

三、关于民族发展

民族发展的含义很广，其中有不少学问可做。这里我们仅就发展的一般意义而言，民族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民族发展不应以剥夺和牺牲其

他民族的权益为前提和条件。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民族发展应该有利于中华各民族，以及整个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因此，民族发展不仅是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同时也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的事业。

社会主义为民族发展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时期不是民族消亡的阶段，而是民族充分发展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说是发展的开始和实现民族的初步繁荣。

下面，我仅从民族发展的角度结合黔江地区谈几点意见：

（1）增强民族意识

增强民族意识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增强民族自我意识，二是增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意识。这个提法首先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提出来的。广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已经多年，为什么还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多年来在群众甚至在领导干部中这种意识并未深化，以致给自治区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不利。

少数民族自我意识究竟好不好？在以前左的时期，为少数民族说几句话，动辄就说是民族情绪，民族意识太重，甚至戴上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民族情绪本来是中性词语，后来竟变成贬义的了，现在多不用这个词了。前面我已经说过，民族自我意识是构成民族的要素之一，它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好的。一个民族当然有自己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共同意识。新加坡华人在李光耀领导下也致力于增强民族意识，提倡“认同”，说没有民族意识，就变成了“伪西方人”。我在海外，遇到许多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观点的华人，可不谈政治，但一谈起炎黄子孙，都很亲切，这就是认同，大范围中华民族认同，小范围各民族认同。很难想象作为民族的一员，不热爱自己的民族，又怎么能热爱自己祖国、怎么能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呢？

川东南土家族、苗族由于长期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强烈影响，失去了自身文化的许多特点，民族自我意识也相对淡化，这是黔江民族地区的一个特点，既有好的一面，也是一个缺陷。因此，应该激发本地地区的少数民族热爱本民族的意识。这对于本地区民族发展是有利的。为本民族发展事业说话（只要不伤害其他民族）是正常的，应该的，是民族认同感的表现，是好事。

增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意识，就是要求我们充分意识到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我们的各种权利并很好地运用这些权利。现在已经有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大法，但它本身还太原则，不太具体，而且在执行过程中还受到种种约束，往往是“小法管大法”，许多事情实际行不通。增强自治意识，就要求我们掌握好本民族、本地区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单行自治条例和法规，并极力争取特殊政策，争取应有的权利。特殊政策和权利是我们民族地区的法宝。在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大国，少数民族小兄弟多要一点儿特殊的东西也是应该的，可以加速发展，缩短差距，这也是整个祖国和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解放以来近四十年，国家在五县的投资（固定资产）仅2.17亿元，不及外边一个县的投资。全地区1987年财政总收入才1亿元，还有近亿元的财政缺口。这种情况再不能继续下去了。

黔江地区下辖五个土家族、苗族民族自治县，这种现象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这只是一种过渡，我以为，在黔江建立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可谓当务之急。在自治州的范围内，许多事情要好办一些，尤其是在制定自治条例、法规方面和加速发展经济方面都是如此。若建

州拖延不决，对本地区发展不利。希望各县在州址的选择上不要过多考虑，应该相信专家学者的论证和上级党政领导的决断。

（2）加速经济发展

黔江地区是“老、少、边、穷”地区，重点的扶贫县，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人平仅373元，不及全国人平1011元的一半。加速经济发展是解决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关键。我们民族地区在发展经济方面面临的最大的矛盾就是，一方面，我们只有加速发展才能摆脱“马太效应”给我们带来的困境；另一方面，由于人、财、物、环境等诸方面的制约，又使我们难以加速发展，致使差距越拉越大。1987年全地区工农业总产值仅比1978年增长68%，而全国全省早已跨过一番；全区人平财政收入1987年仅比1978年增长29元。这说明“马太效应”本身就是民族间地区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一种表现。要克服上述矛盾，也只有设法实现飞跃。落后的通过某种飞跃而跻身于先进行列，在历史上还是不乏其例。因此，我们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总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抓住时机，实现飞跃。

经济发展可以从量的发展和质的发展两方面来看。量的发展主要指投入产出的增长。我很赞成杨汝岱同志的说法，全国有经济过热的问题，对四川，尤其是民族地区，不能一刀切。黔江是才成立地区，又是最穷的民族地区 and 老根据地，还谈不上热，还需要增加投入。当然还要求稳，在稳中求速度、求发展。所谓质的发展，就是讲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形式的转换。这是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当务之急。只有把民族地区传统的经济形式转换为现代商品经济，才能在民族地区奠定经济飞跃的基础。这次科普工作队来到黔江，就是想通过科技扶贫，通过科技普及来促进本地区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形式转换。质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飞跃。例如养猪业，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历来为辅助性产业，但通过科学方法养猪，一举改变了数千年的传统方式，把自然经济转换为现代商品经济。这难道不是巨大的飞跃吗？

（3）发扬民族优秀文化

一个民族能生存至今，总有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增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还可为本地经济建设发挥所用。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是民族的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对此若不加重视，有的很快就会消失，这不利于民族发展。前年我去日本，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向我表示非常希望能得到几件能代表我们四川少数民族文化的物品，有的专家说只要三、四块土家织锦，一套凉山彝族漆器就足够了。后来，我们使他如愿以偿。该博物馆是世界性的、声誉很高的博物馆，举世闻名的文物也摆不了几件。我们赠送的土家织锦和凉山漆器，几天就陈列出来了，足见人家对我们民族文化之珍视。湘鄂川黔一带过去流行的土花被盖最早还是在湘西受到重视，现在改作土家织锦，为各种装饰用品，先是湘西抓，后来鄂西抓，国内外大受欢迎，我们黔江在这方面应奋起直追。

另外，日本还搞了个中国民俗研究会，前几年其会长提出来四川考察土家族的傩戏，当时我不知道这些东西还有否。世界都知有贵州傩戏，而四川傩戏却鲜为人知。前些天中国戏剧家协会四川分会的负责人告诉我说，他调查过川东南土家傩戏，说比贵州的要丰富得多，

可是还未引起当地重视。

川东南少数民族有不少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抢救和保护，要把它们充分利用起来为民族商品经济服务，使之获得新生，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4）培养人才和对外开放

提高民族地区人的素质是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实现民族经济飞跃的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我们川东南地区素有好学的风尚和重视教育的传统。在清代曾是：“丽风华壤，科学之盛，……中州犹或逊焉！”出了不少的人才。我们理应发扬传统，致力于百年树人。在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的同时，要特别重视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素质，通过各种渠道培养出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人才。

民族地区要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黔江地区地处四省结合部，北有长江，东有酉水，西有乌江，还有较发达的公路网，距铁路也较近，很有利于自身的开放。黔江民族地区还有一个特点，同时也是有利于对外开放的优点，就是该地区的土家族和苗族的排他性较少，包容性较强。实行对外开放将使黔江民族地区获得许多实现飞跃的条件和机会。

（5）增进民族团结

黔江地区少数民族排他性少，包容性强，在民族交往中彼此没有过于强调民族间的界限。因此，黔江地区在民族团结方面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还须进一步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随时克服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而体现民族平等的则是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支援，尤其是先进的汉族地区对落后的民族地区的帮助和支援。先进的汉族地区对落后的民族地区给以更多的帮助和支援，是由于民族地区曾经为促成先进付出过重大代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帮助和支援都是相互的。不讲对民族地区的帮助和支援，只讲金钱关系，是不对的。以为帮助和支援仅仅是单方面的，如同恩赐，也是不对的。这都不符合工人阶级的民族观。只有各民族的互助，才能体现民族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民族团结，团结是进步的力量，进步对各民族都有利。平等、团结、互助、进步，这八个字不仅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也是民族长远发展的保障。

（1988年3月25日李星星记录整理）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问题初探

尹大林 奚 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同内地相比,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拟就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出路谈谈我们的粗浅认识。

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在各级党委和党政府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1987年,全省民族地区实现工农业总产值37.19亿元,比1985年增长了19.5%;1987年财政收入3.86亿元,比1986年增长了57.55%。同时,劳动就业工作也取得较好成绩。1978年以来的十年间,共安置城镇待业人员17.5万人,培训后就业率达60%;建立各级各类劳动服务公司197个,劳动服务公司所属企业504个,已有1.15万人在这些企业就业。1987年,劳动服务公司企业的产值、营业额、劳务收入已达到4737.74万元,固定资产1240.18万元,流动资金1409.36万元,10年累计向国家缴纳税金154.89万元。劳动制度、工资制度、保险制度的改革也和内地同步开展;劳务市场在部分州县开放,待业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发放工作起步顺利;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务输出工作也取得一定成绩。劳动就业工作的顺利开展,对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和民族的团结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由于社会的、观念的种种原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内地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劳动就业所面临的形势也更为严峻。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尚有彝、藏、羌等14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中,凉山彝族自治州大都脱胎于奴隶社会,甘孜、阿坝藏族地区大都脱胎于封建农奴社会,至今尚未完全摆脱旧的社会痕迹。解放后,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确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党和人民政府为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投入了数额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但是,生产关系的突变,不等于生产力的突变,这种由落后社会制度向先进社会制度的飞跃,并没有促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同汉族地区相比,经济发展的基础和起点完全不同。以甘孜、阿坝、凉山三州的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为例,1984年比1952年增长了67倍多,1986年比1978年增长了50%。这样的发展速度应该说是很快的了,但与全国全省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相比,差距甚大,而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1980年三州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是362元,比全国当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低371元,比全省低120元;1986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三州七县只有428元,全省是795元,全国是1427元;到1987年,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均产值增加到475元,但仍然比全省水平低402元。1986年,少数民族地区61个县(包括享受民族地区待遇的县),有56个靠国家财政补贴,有的县补贴达上千万元;1987年,全省民族地区财政收入只有3.9亿元,而财政支出则达到了8.6亿元。

劳动就业与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由于经济不发达，地理环境不利，民族地区劳动就业形势与劳动就业工作面临不少困难与矛盾，突出表现为：

1、就业门路狭窄，待业率偏高。

由于财政拮据，地处偏僻，大多数县位于高山高寒艰苦地区，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资金大成本高，造成交通、能源、通讯、原材料等基本建设落后，城镇规模小且建设缓慢，投源（包括旅游资源）得不到充分开发利用，商品经济不发达，第三产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使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缓慢，这是造成就业门路狭窄的根本原因。同时，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大多系森工、矿产、钢铁等产业，对适合女青年就业的轻工、纺织、旅游、土特产加工等产业投资少，发展慢，女青年就业难问题比较突出，劳动就业的矛盾十分尖锐。据对四川民族地区87个建制镇的统计，1987年底共有待业人员1.93万人，平均待业率为3.42%，高于全省平均待业率2.21%的水平；预计今年还将新增劳动力1.2万人，因此，1988年共有待业人员3.13万人需要就业。在87个建制镇中，待业率等于或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仅有14个，占1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75个，占84%；其中，待业率高于10%的有12个，占13.8%；待业率最高达到26%。

2、部分森工和矿产等企业，大量的隐性失业和显性失业人员同时并存。

我省森林和矿产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为开发这些资源，国家在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办了森林采伐和矿产采掘企业，这些企业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提供了大量的原木和矿产品，仅阿坝州林业系统历来为国家上交税利就达4.4亿元。但是，由于在林业采伐上实行高指标，只采不育，致使林业资源逐年枯竭，林木产品逐年下降，企业亏损，一些矿产企业也由于矿源枯竭、市场变化、生产萧条，出现了大批富余人员，形成了隐性失业和显性失业同时并存，就业矛盾异常尖锐的局面。阿坝州森工系统全行业亏损，在职职工27661人，富余职工8000余人，占30%左右；离退休职工26949人（与在职职工之比为1:1）；待业人员4500人，“七·五”期间预计每年还要新增劳动力1100人。目前，森工、矿产企业的待业人员占全州待业人员的半数以上。对这些待业人员的就业，国家和企业想了许多办法，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由于地处高寒，深山峡谷，开展多种经营和发展第三产业受到很大限制，企业自身难以消化，当地政府也苦于无法安排，以致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就业工作中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3、文化教育事业落后，专业技术人材缺乏，劳动者素质较差，影响了经济工作和劳动就业工作的顺利开展。

用工制度改革后，废止了“内招”、“顶替”的办法，竞争机制引入劳动就业，因此，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就成为能否尽快就业的重要条件。但我省民族地区由于基础差，加之师资、经费的严重不足，教育事业和职业技术教育比较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就业工作的正常进行。据统计，1987年，民族地区中小学生在学105.29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3.45%，低于全省16.73%的水平。少数民族地区州一级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只有1所，县一级培训中心只有5所。1987年待业人员就业前培训人数为8486人，占待业人员数的20.98%，大大低于全省31.5%的平均水平。由于师资缺乏，教育质量低，有的县连续几年无一人或仅有个别人考取技工学校。林业、牧业是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的两大优势，但因人才缺乏，发展缓慢，1987年民族地区高级农艺师仅有几人，少数民族没有1人，农艺师300多人，少数民族仅有2

人，高级工程师仅有3人，少数民族只有1人；为群众生产生活服务的能工巧匠和初级技术人员很少。因此，民族地区很多小型工程的自行设计和施工非常困难，许多群众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自身无法生产。

4、传统的就业观念阻碍着“三结合”就业方针的深入贯彻。

长期以来，过多地强调全民所有制经济客观上滋长了人们单一的就业心理，在就业观念上产生了消极影响，重全民、轻集体、鄙视个体的观念和单纯追求单位、身份、所有制性质的现象较内地更为普遍。待业青年不考虑自身客观条件和社会所能提供就业岗位的客观实际，存在择业单一性心理和现象，使“三结合”就业方针得不到全面贯彻，出现了高不成、低不就，许多人无事干，许多事无人干的不正常现象。

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尽管有了较大发展，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经济状况与内地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要从根本上改变财力拮据和技术、人才严重缺乏的状况，在短期内达到与内地同步发展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民族地区许多矛盾的解决，许多困难的克服，归根到底要靠民族经济的发展。如何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劳动就业，逐步缩小与汉族地区的差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

劳动就业工作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我们应当从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出发，充分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坚持“两个基本点”，坚持以改革总揽全局，采取特殊政府和措施，注重智力投资，帮助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扩大就业门路。只有这样，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工作才能从低谷逐步走上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长路。劳动就业既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又促进和服务于生产发展的需要，这是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认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的基本途径和出路在于：

1、大力发展经济，广开就业门路，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87年末，我省民族地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已有25.25亿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3227个，年总产值已达10.83亿元，成为当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们认为，在目前国家财力困难，不可能给民族地区再增加大量投资的情况下，从我省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当前发展经济、拓宽就业门路要特别注意以下三点：其一，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加强横向经济联合。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57.35%，相当于苏、浙、闽三省面积的总和。1987年底，共有耕地1070万亩，人均1.47亩，高于全省平均0.93亩的水平；有天然牧场2.4亿亩，草质优良，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各种土特产和珍稀动物资源繁多，仅中药材就有400多种，虫草、贝母、麝香、天麻等更是享誉中外；林地面积1亿亩，虽然多年开伐，理论蓄积量仍有8.8亿立方米；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达55种，其中铁、铅、锌、铜、锡、黄金等储量很大，具有很高的开采价值；水力资源十分丰富，储量1亿瓩，可供开发的就有6000多万瓦。此外，还有九寨沟、黄龙寺、海螺沟、邛崃、泸沽湖、贡嘎山、小南海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旅游胜地。通过对这些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开发，对民族经济的发展，对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就业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要解放思想，打破区域界限、所有制界限、城乡界限，克服陈旧的“盆地意识”、“区域意识”和“肥水不流外

人田”的意识，大力引进外地、外省、外国的资金、技术和人才，采取利益均沾、适当照顾等多种办法、措施和优惠政策，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改变自然资源不能有效开发利用的状况，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推动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以此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岗位。其二，大力促进边境贸易的发展。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大多与外省接壤，并有与西藏、青海、甘肃、陕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以及印度、尼泊尔等进行商品交流的历史习惯，这是发展民族经济，扩大就业门路的有利条件和重要途径。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一批发展商品经济的带头人，他们根据市场要求，大力发展日用轻工业品的生产与交换；有的根据当地资源状况和群众需要，大力发展民族特需品的生产。这是极具生命力的现象，应当大力扶持和鼓励。其三，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的集体、个体经济虽有发展，但速度不快，不能适应当地社会生产与劳动就业的需要。目前，我省民族地区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仅有6.7万多人，只占城镇在业人口总数的12%，大大低于全省24.22%的水平，城镇的个体劳动者也只有2.5万多人。从民族地区的需要和今后趋势看，发展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集体、个体商业、服务业和消费生产行业的前景广阔，解决城镇劳动力就业的潜力很大。因此，民族地区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利用国家给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大力发展集体、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使其成为安置城镇待业人员特别是待业青年的主渠道，不仅是劳动就业工作的需要，更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2、继续贯彻执行“三结合”就业方针，深化劳动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就业工作的开展。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三结合”就业方针就是基于我国现阶段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生产力发展状况参差不齐这个基点上提出来的。全民所有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但安排每个进入劳动年龄的公民都到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去就业，是不现实的，也是办不到的。建国后我们为此目的可谓是竭尽全力，甚至不惜牺牲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结果只不过是和企业内的隐性失业代替了社会上的显性失业。因此，单纯依靠和等待全民所有制企业招工来解决就业问题的路子越来越狭窄。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结合”就业方针，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才是我们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劳动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的深化，搞活固定工，企业内部实行优化组合，实行富余人员“双辞”等，解决企业的隐性失业问题和实现竞争就业已经提上了我们的议事日程。只有大力推进劳动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的问题，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在少数民族地区，要通过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逐步形成有利于劳动制度改革，有利于企业用工制度搞活，有利于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大气候。劳动部门的同志，更要成为改革的推动者、先行者，不能保护落后，招工上不能搞“内招”。“内招”实质上是一种落后的、带有强烈的依附关系的、具有很多消极作用的用工形式，它不利于搞活企业，不利于促进劳动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不利于劳动者的合理流动。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解决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有条件的县应当审时度势，逐步开放以劳务市场为主的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应当走在前面。劳务市场的健康发展，会给劳动就业工作的开展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3、注重智力投资，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

注重智力投资，加强就业前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素质，是一项不仅关系就业数量、就业质量，而且关系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繁荣的根本性的战略措施。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

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来看,草原建设,苹果、桔柑、花椒、核桃、葡萄等林果业的栽培,良种培植,果品加工,营林、木材综合利用、植保,各种药材的人工栽培、加工,矿产的开发利用,畜产品的加工,旅游业的开发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初级技术人员。乡镇企业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更需要发展商品经济的各种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民族地区经济繁荣,各民族人民富裕,必须依靠本地大批科技人才和初级技术工人的加快培养和成长,否则资源优势就不能迅速转化为经济优势。赵紫阳同志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会上的讲话指出:“哪个民族人才多(包括科技人才、管理人才,以及有本领的能工巧匠等等),哪里经济文化就发展得快。从全国看是这样,民族区域地方也是这样。如果人才缺乏,自然资源再丰富,也无法开发,即使有钱、有项目,也不能发挥作用。这一点,已被大量的实践所证明。所以,关键是人才。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也要特别重视从智力上,从培养、教育和引进人才上给以帮助,这样才能帮到点子上”。面对我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人才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需要,要改变这种人才缺乏的状况,单靠现有的专业人才和上级分配是不行的。我们必须立足于民族地区的实际,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花大力气、下大功夫,注重智力投资,开发本地的智力资源,切实办好基础教育事业和职业技术教育事业,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开展职业培训,是劳动部门的重要任务,它包括中等职业技术培训,就业前职业技术培训和企业富余职工、待业职工的转业培训等方面。我们应当根据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的需要,结合待业人员的具体情况,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加强待业人员的就业前培训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应当积极发展职业中学、职业班;条件不具备的,可充分利用当地普通中学、党校、教师进修学校及其他各类专业院校的师资、设备、场地举办“职业技术培训班”。开展职业技术培训应当注意同成人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积极争取成人职业技术教育经费的支持。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在就业压力大、任务重的重点县,逐步建立劳动就业培训中心。此外,应当普遍开展用工需求的预测,把搞好培训和就业安置有机地结合起来。专业设置一定要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面向工业企业、面向农、林、牧业生产,面向民族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本着当地生产和群众生活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的精神,合理设置专业,确定培训内容。

4、解放思想,打破封闭状态,积极开展劳务输出。

劳务输出具有投资省,见效快,既能治穷致富,又能推动智力开发的重要作用,因而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内地一些地区和企业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充分发挥劳动服务公司的职能作用,加强劳动力供求信息的收集,特别注意沿海一带的劳动力需求动向,多渠道、多形式地组织城镇待业人员向外输出,并鼓励他们组织起来和自找门路到外地提供劳务;积极与内地、外省大中型企业建立挂钩关系,共同创办劳务基地,发展长期劳务合作;积极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为载体的劳务输出。对森工企业的富余人员问题,在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也要积极开展劳务输出,允许待业人员组织起来在当地和外地承揽业务,允许他们带资到劳务市场竞争就业和自谋职业。

5、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资金、税收、劳动计划等工作的根本标准。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中心来进行，生产力标准是我们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就应当支持和鼓励。在资金问题上，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就业矛盾突出、就业经费严重不足的实际情况，要按照重点使用、集中使用、合理使用的原则，用好现有就业经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有力地促进劳动就业工作的开展；要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筹集经费：（1）根据最近几年来待业职工数量不多的实际情况，为尽快、更好地发挥待业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益，应允许民族地区在经省劳动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每年从待业保险基金中提取适当比例作为就业经费的补充来源，把待业职工的转业训练、生产自救同待业人员的培训、就业结合起来；（2）对民族地区发展资金、开发基金和给森工企业转产的多种经营贷款等专项经费，要积极争取省、州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政策规定的审批权限和使用范围内，对以安置待业青年和富余职工就业为主的集体企业给予扶持。（3）积极创办城市劳动信用合作社，广开财源，聚集社会游资，为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服务，促进其巩固发展，扩大安置。我们认为，在税收问题上，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国务院、省政府有关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要用好国家给民族地区的各种优惠政策，在规定的权限内，对以安置城镇待业人员、企业富余人员为主的各类集体经济企业，在税收减免等方面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支持他们的发展。我们认为，在招工计划上，对于经济效益好，确需新增人员的国营企业（包括新建扩建企业），经省计划、劳动部门核准后，应当允许试行“经济效益与招工计划挂钩”的办法，即工业产值每递增10%，劳动力可相应增加0.3%，职工年末到达数由省核实后作相应调整；也可采用由计划、劳动部门预拨、年终结算办法，若超过当年的增人计划，超过计划数应在下一年度相应扣减。

当前，改革、开放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的主旋律，改革、开放不仅教育、锻炼着我们的人民，而且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带来巨大的活力，整个社会生活不论从更深层次来讲还是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我们相信，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各民族人民的艰苦奋斗，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取得长足进步，一定能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1988年11月4日

峨边经济的回顾与展望

秦和平

关荣华

峨边彝族自治县地处小凉山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有着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1988年8月，我们曾在此进行简略的社会调查，现拟出此稿，抛砖引玉，希望能对峨边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建设性作用。

一、清朝民国年间峨边经济的发展

清初，峨边隶属于峨眉县治。乾隆末年，为了加强对这里的统治，清政府在太平堡设立巡检一职，并筑城戍守。嘉庆十一年（1806），由于部分彝汉民众之间的冲突频年发生且日渐扩大，清政府撤销太平堡巡检，设立峨边厅，厅治太平堡。从此开始了“峨边”的历史。

清代中叶，随着川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城镇的建设和扩大，成都、重庆、乐山等城市日渐发展，人口亦日益增加，对外界的经济需求也随之增大，从而刺激着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受其影响，道光年间，峨边万石坪一带的彝民开始采制竹笋，名曰“蛮笋”，运至汉区出售，再辗转销往乐山、成都以至陕西等地。竹笋的采销改变了峨边先前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调节了部分地方食粮的不足。①并成为当地传统的大宗出口产品，延续至今。

因此，追溯清代峨边社会经济发展的缘由，固然是与太平巡检、峨边厅治的设立、城镇规模的初具及扩大，吸引和加快商品的流通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是，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所带来的川省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成都、乐山等城镇人口的增加，消费需求的扩大，从而刺激了峨边的经济的发展。

此外，清季和民国年间中央政府实行的禁烟运动又给予峨边经济以猛烈的刺激。由于内地禁种鸦片，烟源枯竭，而烟民的需要量并未因之有所锐减。供需脱节，烟价暴涨，种烟颇有利可图。利之所在，人所共趋，鸦片就像流行性疾病似地在峨边一带迅速泛滥。“山之麓，路之隅，除冰雪所封，无不遍种青卉。”②尽管大烟的种销使峨边的经济一度出现了惊人的繁荣，烟亩罚金、烟灯捐和许吸证这三项税收极大地增加了峨边地方的财政。但是，这些只不过是附庸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统治之下的畸形的经济繁荣，是以毒害广大民众为前提，牺牲峨边粮食生产、竹笋采制为基础的特殊经济。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旧政权土崩瓦解，鸦片骤然地失去了销售的市场。

二、建国以来峨边经济的变迁及成果

解放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峨边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相应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巨大飞跃。至1987年，峨边的工农业总产值有了显著的增长。其中工业产值比